



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贡献*

——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及中国文明起源范式的演变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学虽然在中国只有不足九十年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考古学,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将大打折扣,我们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将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上^①。事实上,就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和探索,通过中外考古学家的努力,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可以解读为有关认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四种范式:

1.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文化西来说;
2. 30~40 年代,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
3. 50~70 年代,中原中心说;
4. 80 年代以来,多元一体说^②。

虽然主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由中国考古学家完成的,但是范式的转变,往往由外国的考古学家所率先提出,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值得在这里略加叙述。

1. 关于第二种范式向第三种范式的转换

要明了第二种范式的转换,先要把第一、二种范式的建立,简要说明。关于第一种范式,是由当时受雇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 1874~1960)提出的。因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当时只出在河南郑州以西的广大地区,而且越往西越多,而当时世界上已知的彩陶,大都分布在中亚和欧洲,所以他就拟定了仰韶文化——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西来说^③。

但是,从 1926 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开始,就对这个说法发生了怀疑,因为如果是仰韶文

化自西向东传播,越往东,彩陶的质量应该越低才对,而实际上甘肃已经发现的彩陶,在质量上并不比西阴村为高。不过李济的怀疑也仅是怀疑而已,并不能真正撼动安特生的假说^④。实际上“西来说”是 20 年代的显学。

自 30 年代初期中国考古学家在山东历城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以来,以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和徐中舒为首的考古和古史学家,提出中国文化的根在环渤海湾一带,认为“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寻找,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篮。”^⑤的确,以黑陶和卜骨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因其与殷墟商文化的近似,而被认为是商文化——中国文化最紧密的一个源头。通过梁思永先生对安阳后岗三叠层的分析,从而在考古上建构了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的东西二元对立说^⑥,这也就是古史上的“夷夏东西说”在考古上的投影^⑦。

梁思永通过类型学的分析,正确地辨析出后岗龙山文化层与河南浞池仰韶村和不召寨出土的遗物,有诸多类似之处,这是他建构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二元学说的一个前提。但是他从未怀疑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有可能发生过地层上的混乱。30 年代后期,刘耀第一个明确指出仰韶村的遗存实际上包含了龙山文化的遗物,“从陶器方面的各方面分析,确知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其本质各有不同,其时代或有先后。”^⑧尽管刘耀的怀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

* 本文是 2010 年 11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的“中国科技史及其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大会发言。仅以这篇小文,纪念老师安志敏先生(1924~2005)去世五周年、张光直先生(1931~2001)去世十周年。

改变当时已成为学界主流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只不过是肯定豫西地区同豫北地区的安阳所见一样,也可能是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在上,两种文化的关系“其时代或有先后”,但仰韶向东、龙山向西发展的二元论依然流行。

第二种范式的转化,虽然肇始于中国学者的质疑,但却是由三位外国考古学家最先倡导的。起初是安特生。针对中国考古学家对他在仰韶村工作的怀疑,他说:“我们在仰韶村的发掘,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陶鬻、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也就是说,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两者是先后继承的关系,而不是分布不同的同时文化。这应该是第三种范式的滥觞。

实际上直到1956年中国考古学家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在庙底沟等遗址发现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认识,都还坚持二元论的看法^⑩。安特生的上述思想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同。明确提出仰韶——龙山直线发展模式的,反而是两位日本考古学家——三四十年代曾经在中国考古的水野清一和关野雄。1953年,水野清一和关野雄在参加第四届远东史前学会的论文中,明确提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连续发展的文化的两个阶段。水野清一这样说:“在生产红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黑陶,就像在在西阴村和红山后经常看到的那样。最初是不经意的生产,随后就变成有意的了,还原的知识可能已经被应用。此时陶轮可能也出现了,最后终于导致器形的革命性变化。红陶完全被黑陶取代,也即被黑陶文化或者不召寨文化所取代。后者覆盖河南全省包括不召寨、仰韶、后岗等等,也覆盖陕西、山西和发现著名的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在内的山东省,更远至辽东和台湾。目前还没有在甘肃发现,但是所谓齐家坪文化毫无疑问也包括许多与这种陶器相同的因素。”“不召寨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城子崖文化,城子崖是某些中国学者命名龙山文化——地区分布很广包括城子崖遗址在内——的典型遗址。不召寨和城子崖是属于同一个时期的同类遗址,但是如前所述,城子崖文化是这个时代后期的一个阶段,展示了这个文化的最高成就,从此可以很容易地发展为商代的青铜文化。”^⑪关野雄在论文的最后这样说:“彩陶和黑陶文化分属不同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的观点将被彻底推翻(refuted

utterly),因为根据上述彩陶和黑陶的关系,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两种陶器都分布在华北地区的东部和西部,表明黑陶逐渐取代彩陶的过程而不是其他,这也就是说前者是后者派生出来的。很显然那种认为黑陶自山东西进并形成殷商文化基础的理论是一个时代错误(an anachronism)^⑫。

就这样,依据1949年之前发掘的考古材料,两位日本考古学家在安特生的理论基础上又发展出仰韶——龙山——商文化的中国文明的直线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与五六十年代工作在第一线的中国考古学家所构建的模式差不多完全相同,进而发展成为中原文化始终高于并且辐射、影响周围地区的中原中心论,这也成为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主流认识^⑬,直到80年代初期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改变。不过,日本学者的这种说法,由于当时中国大陆与海外的隔离状态,很难说对大陆的学者有多少影响,相反,对台湾和海外的中国学者,比如张光直和李济等,很可能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⑭。

2. 关于第三种模式到四种模式的转换

如前所述,中原中心论在50年代建立之后,前后流行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初期才开始让位于多元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对此,张光直先生曾经就他闻名世界的《古代中国考古学》的写作历程,做过深入的检讨。他这样说:“这本书在1963年出了第一版,1968、1977、1986年各出了第二、三、四版,在东亚、欧洲、北美洲流传很广,被许多西方大学和研究所采作教科书,它在西方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但是它却被我狠狠地改了两次,就是第二版到第三版及第三版和第四版之间。第一版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只是材料都是在一种眼光下收集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在中原做的工作极多,文化层序较长。在写第三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地方出版品如雨后春笋,报告了无数的新资料。我不能不向史实弯腰,就是两件事:一、中原的文明偶然被四裔超越;二、四裔的文化有时被碳十四放在比中原更早的地位。我就不得不给四裔在这第三版里较高的地位。可是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证明在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文化中心,而不是只有我所说的一个核心区。”^⑮的确,如果没有中原之外大量的考古发现,没有周围地区文化序列的建立,要打破中原中心论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对中原中心论的公开挑战,可以认为

一直延迟到 80 年代初期^⑦。但是,外国学者往往就能很早跳出中原中心论的模式,明确提出多元论。

首先在西方著名刊物上公开向中原中心论发出明确挑战的,当推多年在香港考古的秦威廉先生(William Meacham)。他不仅痛批了把一切进步的东西都归因于中原地区和把一切进步的东西都归因于西来一样是极端的传播论,而且明确提出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自己连续不断的传统。他这样说:“对华南地区而言,或许现在大家都会同意该地区的物质文化有相当独立的发展。的确,现有的资料表明,至少到公元前四千纪,也许还要早几千年,伴随着概念的交流和不同文化因子的交相辉映。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多样化的文化区。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文化形貌主要是通过连续而非断裂性的地区进化造成的,但是却通过时空的转换产生了非常多样化的地区传统。”他更明确地提出:“1. 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时代(ca. 10,000- 1500 B. C.)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2. 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化进化,其动力皆来自该地区文化的内部,而不是外面的刺激。3. 地区进化模式的运用,很可能会导致富有成效的探索和解释。”^⑧

那么,如何看待文化的趋同现象呢?秦威廉极端反对文化的趋同现象是从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或者移民的结果。他说,“类似的器物风格或文化因素同时独立地出现在从越南的红河谷到黄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这一事实,如果不是由于人群的移动,整个风格层或者‘全部的产品’都可以当成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的证据。如前所述,技术和艺术方面的变化很可能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内发生联动,试图确定某一项变化特征的发源地是困难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不过,他也承认,两个或多个文化的并行进化掩盖了更深层的现实,比如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文化和工业交流,比如它们很可能来源于同一个物质文化和同一个技术传统,最后很可能又走向融合;比如它们或许在考古学无能为力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价值观方面密切相关,但后者却足以决定创新和文化变化的走向和速度^⑨。虽然当时可供讨论的考古材料和碳十四年代数据还相当缺乏,但地区文化变化的图景,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史前文化的复杂形貌,显然远非中原中心论所能涵盖。文化多元,中国文明的多中心起源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秦威廉的研究虽然得益于他在香港多年的实际工作,也得益于他对东南亚考古成果的了解和借鉴,但他更多是从中国内地已经发现的材料和已经公布的年代数据中找寻证据。实际上,中国内地许多考古学家的研究,对他得出自己的结论,都发挥了积极作用^⑩。他自己的研究,反倒因为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因为语言和环境的限制,未必对国内学者产生过多少实际的影响。实际上此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时代,学术环境开始宽松,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多元论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3. 简短的讨论

如果说从二个范式到第三个范式的转换,是有三个外国人——一个瑞典人和两个日本人——最先提出的,那么第三个范式到第四个范式的转换,也是由外国学者——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人——最先系统地发端并公开向世界公布的。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究其原因,外国学者没有或少受中国传统史观的影响恐怕才是主要的。古史上“夷夏东西说”的概念深入中国学者的内心,所以很容易在考古学上建立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二元论。但是,外国学者对中国古史并不熟悉^⑪,他们很容易就事论事,根据考古材料自身的分析,排比出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直线发展模式。

一旦由仰韶——龙山——商文化的直线发展模式发展成为中原中心论,这种模式因为暗合了传统史学的华夏中心观——也可以说考古学上的中原中心论,就是传统史学华夏中心观的投影——再加上五六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要突破这个模式,也就十分困难。但是,没有受过多少中国传统教育的西洋学者,本来就不受华夏中心观的影响,一旦看到某些中国南方地区的碳十四年代并不比中原地区为晚,某些文化因素很难视为中原地区影响或移民造成的结果,自然就选择了多地区发展的模式。张光直先生晚年检讨五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中原地区人口大扩张造成周围地区发展的所谓“龙山形成期”理论(Lungshanoid culture),也认为他的解释,是受传统史观教育的影响。他这样说:“我这核心区偏见是从哪里来的?我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传统的史学。”^⑫他也认为外国学者之所以最先挣脱中原中心论的束缚,是因为少受华夏中心观的影响^⑬。

所以,在中国文明起源模式这个问题的讨论

上,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也可以说这四种模式是经过中外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得以完成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释:

① Chen, Xingca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Vol.19, No.2 (2009):4~12.

② 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见氏著《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论丛》,第69~74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③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5号,1923年。

④ 李济:《中国最近发现之史料》(1928),见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卷一),第322~3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第556~557页,1931年。

⑥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1933),《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91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⑦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6),见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第247~29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⑧ 刘耀:《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1947),见氏著《新石器时代》,第10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⑨ Andersson, J.G.,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MFEA, No. 15, 1943, p.76. 中译文转引自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2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⑩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⑪ 夏鼐:《河南浞池的史前遗址》(1951),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上),第336~34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另见尹达:《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1954),见氏著《新石器时代》,第147~1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⑫ Mizuno, Seiichi, *Prehistoric China: Yang-shao and Pu-chao-chai*, P4FEPC, 1 (1956), pp. 96~97. 中译文引自陈星灿:《旧闻新读——考古人类学界的人和事》,见氏著《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第224页。

⑬ Sekino, Takeshi, *On the Black and Gray Pottery of Ancient China*, P4FEPC, 1 (1956), p.113. 中译文引自陈星灿:《旧闻新读——考古人类学界的人和事》,见氏著《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第224页。

⑭ 通论性的世界史前史参见 Jacquetta Hawkes, *Prehistory*.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Pt. 1), London,

1963. 其他国际上通行的有关中国考古和上古史的著作,参见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st, 2nd and 3r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1968, 1977.

Cheng T'ie-Kun, *Prehistoric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Ho Ping-Ti, *Cradle of the East*. Chicago and Hong Kong, 1975. 中国有代表性的论著,参见安志敏:《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见氏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第1~1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张光直:《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本)》第一本,第285~328页,台北,1972年。

⑮ 提出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主张仰韶——龙山——商文明直线发展的安志敏先生,在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中,从未引用过水野清一和关野雄的这两篇文章,而持同样看法的张光直先生却在1959年的论文里引用了这两篇文献。参见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1959),见氏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45~1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另参见陈星灿:《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第223~225页。

⑯、⑰ 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见氏著《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第17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

⑱ 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1981),见《苏秉琦考古论文选集》,第225~23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⑲ William Meacham, "Continuity and Local Evolution in the Neolithic of South China: A Non-Nuclear Approach",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8, No. 3 (1977), p. 419.

⑳ William Meacham, "Continuity and Local Evolution in the Neolithic of South China: A Non-Nuclear Approach",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8, No. 3 (1977), p. 427.

㉑ 他提及夏鼐和安志敏先生60年代对长江流域重要性的论述,也曾提及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认为几何印纹陶发源于东南诸省的研究,这些都是他立论的重要依据。参见 William Meacham, "Continuity and Local Evolution in the Neolithic of South China: A Non-Nuclear Approach",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8, No. 3 (1977), pp. 419~440.

㉒ 傅斯年先生说西洋人“读中国书不能亲切”,就有这个意思。见傅斯年:《历史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岳玉玺等选编《傅斯年选集》,第17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㉓ Kwang-Chih Chang,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6~57.



知识考古

本期导读

如果我们要获得更多关于古代或者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知识,就需要更深入地完善并熟练运用考古学这门知识,因为在现代科学中,一门科学的知识基本上是一整套科学运作的系统。

按照库恩的科学哲学思路,科学发展有范式,有范例,前者指的是一时代具有普遍性的从材料到研究结论的一整套基本的操作方法与方式,后者指的是这种范式下的代表性研究个案。那么,什么是考古学的范式和范例?什么是当下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范式?这组文章,基本上就是以知识考古的视角进行的一种整体性的反思。

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

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

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考古学为代表的功能性研究虽然被较多地介绍和接受,但是纵观其成果和得失,也判定它们仅仅走到了入口甚至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尚缺乏系统性的借鉴和反思,未构成可以称为是学科范式的范例。他还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考古学中功利主义色彩浓厚,更关心考古学的技术与方法,不愿借鉴理论;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固有的理论局限或者非理论化取向,比如局限于马列经典对社会发展阶段与状况所做概括的生搬硬套,还有就是中国固有的概念系统天然地屏蔽新考古学等理论与术语,等等。他提出,虽然近年来我们在技术国际化方面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而在“理论多元化和方法系统化”方面还需要不懈地努力。

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贡献——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及中国文明起源范式的演变》讨论的仍然是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不过这里是个案性的范式,是对当下各界普遍比较关心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历程的系统的、整体性反思。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点,也是考古资料、理论方法的试金石。他概括中国考古在这个课题的研究

上大致经历了四个范式或者说阶段性认识,并从资料到方法、到理论包括观点形成的时代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寻绎考古学进步和学术运行的内在轨迹。文中着重对从解放前的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到上世纪 50~70 年代盛行的中原中心说,以及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成为主流观点的多元一体说形成与流行花费了较多的笔墨。他指出,“在中国文明起源范式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也可以说这四种范式是经过中外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得以完成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说明,一种可以构成范式的学说的形成,既是时代性的标志,也必具有广博的学术与社会基础,考古学必须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汲取当时一切必要的知识与思想,方能有所进步,固步自封,最终只能使自己变成井底之蛙。

曹兵武的《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一文,探讨的是从具体的考古资料到知识与思想的一般路径及其在考古学学科发展中的必要性。文中既涉及到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考古发掘、调查资料的处理包括保护,以及考古新闻报道、报告、论文、概述性著述和普及性著述等几种文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涉及到由资料到理论和思想相关信息与知识的展开与构建的过程,涉及到由私密或者专业的知识到公共的知识的交互反馈及相互促进作用,还涉及到公共考古学与考古资源的管理问题。总之,对于考古资料的多元视角,对考古过程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需要。

考古学不仅仅发现物、发掘物、研究物,连最保守的考古学家也承认考古学可以由物见人,研究古代的技术、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关键性问题。当然,以巨大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及其文化为对象的考古学在新考古学范式下提出追寻人类文化进步的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曾经令一代学人为之振奋,尽管现在看来不仅是考古学,连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是至今我仍然十分敬仰这种豪迈但却是建基于理性与科学之上的学科理想。我认为,新考古学最大的贡献是其系统性的思维与研究方式,这是指导其文化结构论、功能论、适应论和过程论的背后的哲学基础。近代科技的专业化和精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科学与社会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整体性的科学和系统性的反思,需要构筑一种关于文明和文化的整体性学问,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不同人类文化和平共处的伦理与科学问题,并提升人类驾驭自己的物质性创造的综合能力。这一方面,考古学是个很好的试验田。为此,相对于捍卫考古学的纯洁性,我认为考古学不仅应该更开放,而且应该更自觉,要加强对学术史、学科史的研究,开展考古的考古——考古学也需要更多的学术自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考古学需要补课。一是亟需补上西方二战之后已经走过的考古学诸范式或者发展阶段,包括系统论的新考古学、文化相对主义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等内容,扩大考古资料的信息含量,扩展并深化考古学研究的学术目标,提升考古学的科技含量与理论思维等科学水平;二是要自觉地迎接当下中国的文化复兴与文化遗产时代,自觉地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价值诠释和理论支撑,发展公共考古学,普及考古知识,融入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大潮。否则,中国考古学有边缘化、沦落为基本建设工程随工清理的危险。

一方面考古学作为科学,有其内生的知识追求和增长链条,另一方面考古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处理人类共同的遗产,考古学的进步与社会环境密切关联,对考古学范式的反思,是理解考古知识状况与考古学进步动力的一把钥匙。

(曹兵武)